

兹的家族简史及其生平创作简介,凸显他对希伯来文化传统与欧美现代文化传统的传承及其社会参与意识,继而从欧洲梦的破灭、在巴勒斯坦的生存挑战与身份变更、关于巴以关系问题、“家庭——窥视民族历史的窗口”、“身在哪儿,哪儿就是世界中心”等五个层面解读其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

许金龙先生作了题为“儿时记忆对大江健三郎文学的影响——以《两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为分析对象”的讲座,探讨儿时记忆在大江健三郎文本中的体现、变化及解读。首先阐释以“病迹学”研究儿时特殊生长环境对成年时期创作的影响以及作家心理状态的文本表征的可行性,继而以大江健三郎的家史为线索,结合丰富的文本证据和作家自述解读《两百年的孩子》中逃散、暴动等主题。

王向远教授题为“日本文论选译”的讲座包括四个方面。1.指出东方文学研究中文学理论翻译的欠缺,浅析日本近代文论对中国的影响和重译日本文论的必要性。2.从创作主体论、审美态度论、语言表现论、创作风格论、审美理想论介绍日本古代文论私人性、非社会性、家传性的著述方式以及散文化、随笔化的文体特点。3.探析江户时代后期朱子学和西学对日本文论著作由随笔性的软性文体转化为理论性、论辩性的刚性文体的影响。4.从启蒙功利主义文论、写实主义文论、浪漫主义文论、自然主义文论,以及余裕派、私小说、心境小说论五个方面介绍日本近代文论。

陆建德先生在题为“英国作家狄金森对中国的论述”的讲座中首先介绍了路易斯·狄金森同情弱者的一贯立场及其对他的公共精神的影响,进而阐释他对国际组织力量信任感和他的“世界主义”理想,并探讨了他对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认同和敬重以及他对中国的矛盾、辩证的态度。

2010年“东方文学经典重读”暑期学校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优势资源,为学员搭建了一个与大师面对面交流、跟踪本领域学术前沿、开拓学术研究视野的平台。讲座安排紧凑而有实效,各位主讲老师和学者学术态度严谨、学术视野广阔,讲座内容兼顾宏观的学科理论研究和微观的文学文本研究,主持人点评精当到位,专家与学员互动热烈,极大地触动了学员研究东方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修正了学术态度和学术思维,启发了学术灵感。鉴于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进程中的重大意义及其在学界和高校课程设置中相对弱势的现状,笔者由衷地希望“东方文学”暑期学校继续举办,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关注和研究东方文学,更好地展现世界文学的多元之美。正如乌玛女士所期望的,“让所有的人类民族保持他们的个性,聚到一起,不是死板的千篇一律,而是浑然一体,充满生机!”

(罗美玲: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责任编辑:谭咪咪)

## 对治时弊 嘉惠学人: 《新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批评经典》读后

刘亚丁

当下的国内学术界一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上又存在缺陷。具体到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来说,发表了大量的经典解读和阐释的文章;从文章本身来看是新意叠现、宏阔深刻,而且能够自圆其说。但这样的文章完全不顾及学术界此前的研究状况,很有可能是同水平重复,其主要观点或许在50年前、100年前就已有前贤做过透彻的论述,因此实际上并没有推进学术发展。如果这种现象只出现在一两篇文章中,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但糟糕的是,这几乎成了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常态”:即学术论文的写作者要对某部经典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通常不会去关注先贤对这部作品已经说过什么,还有什么研究空间和前景,自然就谈不上同先贤时彦的切磋辩难,也就不可能达到经典研究的切实推进。不少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

也只是在开始部分有一个简单的学术综述,而在后面具体的行文中却不与国内和国外的同行作任何讨论,一味地自话自说。尽管我们现在获取本国和国外的研究资料的途径和手段比过去要便捷得多,但我们的研究观念反而退步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和主持下,我国连续出版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如杨周翰先生选编了《莎士比亚评论汇编》,季羨林先生选编了《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袁可嘉先生选编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还有倪蕊琴先生选编的《俄国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孙美玲先生选编的《肖洛霍夫研究》,董衡巽先生的《海明威研究》等。那时的优秀学者们或参照这些资料集,或自己从国外的期刊获取研究资料,对国外、国内的研究成果比较重视,他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多半有其“研究的起点”,因此他们的成果会对学术会有所推

进。面对他们的研究,今天的同水平重复者难免汗颜。这里有研究者自身的问题,但总体学术风气的浮躁也难怪其咎。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批评经典》犹如为学术风气降尘祛躁的及时雨,因而应该受到欢迎,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

《新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批评经典》(以下简称《批评经典》)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确实是有出新的地方,新就新在主编和全体编者“述而不作”,放弃了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编撰者的那种将自己现成的结论给读者的写作方式,在选定的每一部经典范围内,由编写者自己撰写研究综述(或称“学术史”),再加上关键词、参考文献、网络资源、作品推荐本和批评文选构成特殊的文学史文本。

在研究综述部分,编撰者们(顺便提一句,每部经典作品都邀请国内对其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来担纲撰写)力图追述该经典作品的历时性的批评学术史。一部经典作品流传到今天,由于批评家的评论、研究者的阐释,就会形成一部经典作品的学术史。不少编撰者考究源流,尽量还原其学术史的始源与流变。如关于荷马史诗,编撰者追述了古典时期赫西俄德和欧里庇得斯在自己的作品中与荷马的“对着干”,分析色诺芬和柏拉图等哲学家对荷马的贬斥。在中古时期,则有新柏拉图主义者在编撰、音韵、文辞和目录方面对荷马史诗所下的“小学”功夫,反而导致了荷马研究的衰微。在近代时期,既有蒲伯、弥尔顿等在创作中对荷马的模仿,又有赫尔德、歌德等从荷马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诗学,更有《论荷马的原创天才》等专书。在编撰者对《神曲》的学术史追述中,清晰地描述出了14—16世纪批评中对其信仰和风格的关注,18—19世纪批评对其历史和自然问题的关注,20世纪批评对其古代与现代问题的关注。对王尔德的《道连·葛雷的画像》,编撰者回溯了其刚刚诞生时所受到的抨击和质疑,描述了它在当代批评中的“时来运转”。在现代时期,则有多派并进共治荷马的局面。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研究的学术史并不算长,但编撰者依然将其批评、研究史作了历时性的梳理。

文学经典是蕴藏丰厚的富矿,批评、研究者是独具慧眼的发掘者,而《批评经典》的编撰者则勤于用力,将批评、研究者所展开的经典的“多相面”“运输”给当今的读者。如在梳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学术史中,编撰者充分展开了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对《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的解释,海德格尔把这一合唱歌当成了“人颂”,对其中的关键词进行了翻译、辩难和深入推进,从而在批判康德和荷尔德林中,彰显了第一合唱歌的形而上学魅力。接着编撰者又转述了20世纪古典语文学家伯纳德特的《安提戈涅》义疏,从而揭示了《安提戈涅》的政

治神学维度。在对贝克特的研究史的综述中,编撰者也着力发掘了一些批评家对他的哲学意义的观照。编撰者对文学经典中的哲学、神学政治学的阐释的揭示,在传统文学研究之外别开生面,证明了文学阐释的无限可能性,对今天的学者的想象力是一种良性的诱导。在对并不悠久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学术史的梳理中编撰者展开了作家传记批评,转述了丘达科娃、雅诺夫斯卡雅分别完成的米·布尔加科夫传记的内容。接着编撰者挖掘了研究者们对具有“高度互文性”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文化谱系和原型的深入探析:如古斯塔夫·穆勒的《本丢·彼拉多》同小说中的彼拉多的关联;《约伯记》、果戈理的《可怕的复仇》、歌德的靡菲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伊凡·卡拉玛佐夫成了这部“恶魔小说”的渊源。编撰者还追述了研究者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和结构的精彩阐释。关于《洛丽塔》,编撰者也梳理了内容丰富的关于“洛丽塔”的形象、关于作品的风格和主题的研究著述的主要观点,其中多有洞见。如朱·莫那罕的《论纳博科夫》从文体学的角度分析:纳氏是像普鲁斯特一样,是一位怀旧的艺术家,“善于通过记忆艺术从逝去的岁月里发掘丰富的素材”(梁坤 531),意欲借此找出人类认识的边界,并从中认识永恒的真理。纳的小说不是直接模仿生活,而是“对生活模仿的模仿”(梁坤 531)因为他戏仿传统文体,如自传、鬼故事、形而上学的玄想和学院评论注释。他的戏仿不是对传统文体进行草率的模仿和恶意破坏,而是出于对每种叙述文体自身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他的戏仿和嫁接使这些创作形式获得了新的创作前景。《洛丽塔》正是在此基础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开创了一种新的黑色喜剧。

## 二

编撰者在文学名著的批评文章的选择和翻译方面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选文的特点是突出的。

厚今薄古显而易见。从绝大多数选取的批评文章来看,基本上是选的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多是近几年的。这些批评文章从当下的话语和文学批评语境出发来观照经典,使古老的文学经典经过当下的批评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如关于《唐吉珂德》选取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英国学者埃·赖利的《塞万提斯的文学理论》译自1998年的一本专著,第二篇是墨西哥的本·瓦尔迪维亚的《堂吉珂德的世界观》,译自1998年的一本论文集,第三篇文章是墨西哥欧·曼塞拉的《现代小说〈堂吉珂德〉的断裂传统》,该文译自1999年的一本论文集。最可称道的是最后一篇论文,它讨论了现代性与《堂吉珂德》的复杂纠结。曼塞拉认为,现代性产生于16世纪思想界中宗教与唯物主义、教条与实验科学间的对立冲突。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促使人们思考现代性和它的规范问题。社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规范,艺术则不倦地否定这些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堂吉珂德》具有“决裂的传统”。

“小说对文化是抱批判态度的。它质问了阅读和文学本身的意义,质问了文化制度的组成——教会、君主制和贵族的结构和权力,质问了思想和历史的特殊现象——社会变化的动力、帝国和奥地利王室的衰落。现代小说并不探讨实验科学——理性主义的地位,它探讨的是现代性带来的人类价值的动摇与涣散。”(梁坤 103)这样的讨论尽管是从具体作品入手展开的,但对当下学者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是有启发意义的。对《浮士德》的批评编撰者选取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阿多诺的收入1968年的一个论文集的《论〈浮士德〉的最后一场》。第二篇是M·奥斯滕发表于2004年的《进化之旅——论歌德的荷蒙库鲁斯的现代性》,作者认为,歌德所写的人造人荷蒙库鲁斯所说的“我带路”,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预言科学幻想的‘克隆怪物’的出现”,另一方面表明“歌德对克隆人采取讽刺态度”(梁坤 146)。作者的结论是:歌德“对人类的进步的信仰看起来要小得多,显然他认为小小的进展是可能的,但不会有太大的进步”。(梁坤 150)第三篇也很新,是发表于1999年的J·拉特纳的《深层心理学视角下的〈浮士德〉》。该文认为从深层心理学来看浮士德是处于正常人格和非正常人格之间的,他发现了浮士德的矛盾性,并指出了他的希望:“这种对于‘获得统一完整和思想发展’的渴求正是浮士德身上所具有的健康向上得令人称奇的东西,它足以掩盖他身上所有的‘神经病患者特质’。谁若本身具备这种巨大的发展潜力却因为生活的际遇和命运的安排而无法充分施展,那他自然暂时会深陷绝望,但他定会告别恐惧,而不是被无尽的恐惧所左右。”(梁坤 152)这些文章都从当下的语境出发,发掘出文学经典的常读常新的意义。

各种批评方法各显身手。20世纪文学批评观念经历了现代转型,由传统的以实证主义和自由意志哲学观念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观念转向了多种多样的批评观念竞相登场。文学经典自然而然成了各种批评观念和方法各显身手的“练兵场”,它们都要借解读经典作品来话难对手,崭露头角。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就成了心理分析、读者反映批评、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巴赫金式的对话分析、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解剖对象(梁坤 303)。《批评经典》的批评文选在厚今薄古的背景下凸现了不同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在面对同一部文学经典中的对话和辩难(其实这个特点在多数编撰者写的学术综述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如编撰者选了三篇评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文章:苏·S·兰瑟的《〈简·爱〉的遗产:单一性的权力和危险》,戴维·洛奇的《火与“爱”:夏洛蒂·勃朗特的尘世元素之战》和桑·吉尔伯特、苏·格巴的《自我与心灵的对话:〈简·爱〉》。第一篇和第三篇大致算女权主义批评,第二篇则分析《简·爱》中客观关联物(如火)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在第一篇文章中分析了《简·爱》中女性个人叙述声音的形成,“《简·爱》为‘夏洛蒂·勃朗特’和‘简·

爱’双双赋予了独创和自足自律的叙述声音”。(梁坤 199)在第二篇文章中,戴维·洛奇分析了火作为隐喻在《简·爱》中的作用:火的意象频繁出现,家宅的炉火联系着人的生命力,火被用来隐喻简的反抗性格。第三篇女权主义式的批评文章分析禁闭和逃离的故事,借以展示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在形式上作者声称自己是在同戴维·洛奇的文章对话,他们强调要揭示作为火的对立面的寒冷等与简的心理世界的关系。编撰者所选的前三篇关于爱伦·坡的《被窃的信》的文章本身就构成了一场延续了若干年的方法和观点对立的争论。拉康的《关于〈被窃的信〉的讨论会》从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研究具有象征力的信的能指的作用。德里达的《真理的供应商》则针对拉康的上述文章开始驳难,他指出拉康的分析在形式上存在局限性,而且没有触及到叙述结构的讨论。有趣的是解构大师在对《被窃的信》分析中也受到精神分析派的“感染”,他提出了女性“阉割作为小说的真理”的问题,并认为这个真理促使产生使“信和能指,或是崇拜物回归到它们合理位置的力量”(梁坤 226)。芭芭拉·约翰逊的《引文背景:坡、拉康、德里达》则讨论了拉康和德里达等学者过去在批评《被窃的信》中的分歧(这篇文章与德里达的上述文章收入同一本论文集)。有关《李尔王》的批评文选既有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的《培养焦虑感李尔王和他的继承人》,也有文化唯物主义者乔纳逊·多利莫的《李尔王与作为本质主义的人文主义》,还有生态批评学者加布里埃尔·伊根《超自然力与恶劣天气》,这是由编撰者有意识组织的一场众声喧哗的对话。

选文中的厚今薄古和各种方法之间的论争,使《批评经典》本身值得进一步深思。“今”固然好,但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为了“今”《批评经典》被迫牺牲“古”(大概是因为篇幅所限,不得不割爱)。然而“古”并不意味着“落后”或“过时”,在“古”中有大量的批评经典存焉,但《批评经典》选进来的并不多。同时,现在各种新的方法之间的热烈争论固然产生了不少有趣的批评文章,但是若干年之后它们未必会被人们当成“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副标题中的“批评经典”几个字似乎是可以再斟酌的。再者,本书由于要照顾批评方法的多样性,选取的个别作品未必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一流文学名著,而舍弃了某些公认的一流文学名著,这从目录中就可以看到。但瑕不掩瑜,《经典批评》的成就是巨大的,它改变了过去的文学史封闭的线性描述,建构了一种“立体评析”,兼具“客观化教材”、“开放性索引”和“研究资料”的性质。这本教材承袭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好传统,也采用了一些其中的成果,但它又综合众家批评文章于一本书中,这样就会大大便利学生和做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人。《批评经典》将各种批评方法汇集于一书,善于学习和领悟的人通过认真阅读此书,认真研习其所针对的文学经典,融会贯通,或可得到批评的智慧,使眼界更为开阔,具体批评方法的运用也更为自如。一般做论文的人,

也可以借此克服先前的不顾及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弊病,从此书中找到关于该经典的重要批评文章,或者是重要批评文章的线索,按图索骥,生成同先贤对话的意识,使其对经典研读更深入一点,更学术化一点。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刘亚丁,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责任编辑:谭咪咪)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梁坤主编:《新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批评经典》。北

## 批评的危机:评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

胡可清

**内容提要:** 本文从解构主义文论家保罗·德曼揭示批评和危机的同一性入手,分析了《结构主义诗学》的理论渊源和理论谬误:《结构主义诗学》探讨了语言/言语理论对结构主义的影响,并试图以语言体系为模本建立文学话语体系。静态的文学体系过于追求统一性和稳定性,不能包容嬗变和异端,遮蔽了语言和现实的本质,从而为解构主义出场留下伏笔。

**关键词:** 结构主义诗学 语言 言语 话语 文本

**作者简介:** 胡可清,徐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Crises in Criticism— A Study of Structuralist Poetics by Jonathan Culler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mences with the revelation of the immanence of crisis and criticism, and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roots and theoretical fallacy in Structuralist Poetics. The book reveals the impact of the theory of language/parole upon Structuralism and endeavours to establish the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langue system. For pursuit of uniformity/stability, the static literary discourse denies transformation and eccentricity and therefore obscures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reality which paves the way for the emergence of Deconstruction.

Key words: Structuralist Poetics; langue; parole; discourse; text

Author: Hu Keqing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nd American and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hkk0406@hotmail.com

### 一、批评的危机

后结构主义文论家保罗·德曼曾在得克萨斯大学宣布文学批评出现了危机,他认为美国文学学者们对新批评和紧随其后的欧洲实验批评一直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讨论批评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所谓的新新批评是否具有持久的价值,我们还能循着老路继续前进吗?在宣布危机到来的同时,德曼引用了马拉美的诗歌评论:“决定批评原理并使之成为知识大厦基石的根深蒂固的规则和传统受到严峻的挑战,导致整个知识体系风雨飘摇,颓然欲倾”。(De Man 3)权威理论家们看到批评危机存在的内在性和本体性,批评的本质就是自我反思,自我解构。德曼认为批评和危机从来就是一

体,批评的本质存在取决于不断反思批评自身的本源和目的。在推崇实用中庸主义哲学的氛围中,固步自封的英美学者们忽视了批评的危机,必然的结果就是,大脑永远处于休眠状态。批评停止了,批评家不是成为文本敏锐善感的专业读者,就是成为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的人文学者。只要不再反思质疑自己的工作,他们从事的就不再是批评,只是依靠惯性延续过去的工作。德曼是这样阐释的:“关于当代评论我们的问题是,批评进行自醒达到反思本源的高度了吗?批评在追问批评存在的终极意义吗?”(De Man 18)伪批评为何存在如此之久?我们可以在不同流派的批评家所熟谙的阅读模式中寻根溯源。对于现代主义者,阅读是客体和主体的邂逅,艺术作品和个体自我之间的邂逅——前者是